

“变中求统”：大一统政治思想研究中的语境与逻辑问题*

林 毅

内容提要：大一统作为一种重要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实践遗产，时至今日仍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现实政治发展。围绕着大一统内涵、过程、性质与影响的认识与评价，思想史研究中也长期存在着诸多争论。但无论对于大一统本身所持态度如何，争论各方往往都倾向于将大一统视为一种独立于语境之外的固定结构。作为一种限制性认识前提，这无疑妨碍了对于大一统政治思想与实践发展史的全面理解，更影响到从学理逻辑上阐释大一统与现代中国国家建设与治理事业的内在关联。有鉴于此，在大一统政治思想研究中，有必要超越“正典解读”的束缚，以变的思维考察统的历程，同时也以统的逻辑来整合变的史实，将对大一统的思想史解读放在问题逻辑的语境中，关照智识语境与政治语境对其评价的影响，并慎重地探讨其内涵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规律。唯其如此，对大一统的关照和本土化阐释才真正具有了历史性。

关键词：大一统 变中求统 语境解读 逻辑阐释

现代化进程对于非西方世界的冲击，往往意味着一种双重转型压力：一方面，生存与竞争的动机^①带来了适应性挑战，型塑着与之匹配的政治与文化结构；另一方面，传统与现代的两分又造成了断裂性危机，动摇着前现代社会中形成的整体性根基。^②于是，对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能否以较小的风险和代价推动转型，在“从边疆到边界”的转化中^③保留“中国”的完整性，便成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关键议题。显然，对于这一议题的有效回应，不仅需要移植与建构新制度的尝试，也没有理由排斥从“古代材料”中去努力发掘“对今天仍然行之有效的东西”^④。而作为一种深层“文明结构”，“大一统”的独特价值无疑是不应被忽视的：从历史上看，它对应于一整套不断生长、完善的政治制度，这套制度中的许多成分经历了现代化荡涤后仍然存在，并为当代中国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新逻辑研究”（19BZZ002）的研究成果。

- ① 与前现代世界不同，作为一个世界历史进程的现代化，使得不同文明体在致用层面的价值观高度趋同了，文明体间的竞争不再表现为诸如对“此岸世界”“彼岸世界”迥异追求的博弈，而反映为根据同一标准争夺国家间竞争锦标赛中的领头羊位置。
- ② 这种断裂性危机的含义同样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历史与现实的断裂，另一方面则是个体与整体的断裂（包括民族与国家的断裂），换言之，这也意味着新生国家中源自公民个体与群体的深刻认同性危机。
- ③ 参见周平：《我国边疆概念的历史演变》，《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 ④ 原文为“一种文明的历史，就是对古代材料中那些对今天仍然行之有效的东西的探索……这些东西中无不存在着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短路。”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第4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的治理提供了有益资源;从思想文化上看,它塑造出中国人具有对政治统一与稳定强烈诉求的心理特征,从而为中国“完整地转型到现代国家”^①,避免陷入分裂窘境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从政治认知与认同的角度上看,“大一统”也不失为在现代语境中诠释“何谓中国”“何谓中华民族”的一种有用资源。总之,作为一种长时段的存在,大一统是以政治思想为核心,以相应的制度安排与政治实践为依托,以文化影响扎根于本土的重要传统因素,它既难以被彻底摧毁,也无需被完全颠覆;它不应被粗暴地视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包袱,相反,却完全可以通过得到科学的诠释和合理的运用,成为重新连接现代化冲击下一度断裂的“传统中国”“现代中国”的枢纽,使中国发挥出制度与文化方面的比较优势,进而有力地验证人们确实“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成绩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②这一论断。因此,对大一统的当代阐释本身,正是当代中国学术跨越“西风东渐”阶段的题中应有之义,完全可以为在现实的语境中重建中国理论界的“学术自主”“学术自信”做出贡献。^③

一、问题的提出:大一统为何需要得到思想史的重新诠释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大一统当代价值的有效开发,终究不能停留在对其浅薄的“自古以来”式的认知层次上,同样,沿着所谓“整理国故”“复兴传统”的旧路,大一统也并不会自动嵌入到现代中国的政治结构中。这就提出了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方法、一种新的考察维度的问题。简言之,我们需要大一统,并且能够运用大一统来服务于现代中国,本质上取决于它在思想和实践层面都是“多元一体”^④的,始终处于包容开放、变化成长的进行时态中:它既是传统国家建构的产物,也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前提;它既影响到中国现代化的演变轨迹,也接受着现代化进程的革命性改造。大一统从来都不是按其字面含义来一劳永逸地规定了中国历史,而是在自身的变化中适应并影响着中国历史。这种“变中求统”的认知原则,将引导着我们确立起正确的思想方法前提,并且依托全面的历史考察为基础,诉诸理性的现实关怀,去建立起历史与现实间的有机关联。相应的,那种在回溯大一统历史记忆中发现的文化自信也将变得更加稳固,而对大一统资源的其他“解释性”^⑤运用也将更加得法、有效。

毋庸置疑,无论是在学术史还是政治史中,大一统都应首先被定义为一种重要的政治思想。因此,思想史方法的选用,将直接影响到思想史角度切入大一统研究的路径与结论。一段时期以来,受限于“追踪-回应”西方主流的研究范式,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者往往倾向于直接套用西方哲学史的传统写法。这使得无论在借用成型概念,编织系统逻辑,还是取舍与诠释材料方面,研究者所致力于呈现的,都只是一个蕴含着思想本体论(ontology)预设,并存在于独立自足空间中的“经典”汇编。但不同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传统写法,“中国古代的知识和思想是否能够

① 林尚立:《大一统与共和:中国现代政治的缘起》,《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十六辑。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0-471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③ 有学者说道,“如果我们想要重新发现中国人文学的精髓,就必须从复活这些概念的本意开始,不是把它们当作验证西方进步概念的工具和手段,而是真正视其为建构中国新型历史叙事的可靠资源。”参见杨念群:《中国人文学传统的再发现——基于当代史学现状的思考》,《社会科学文摘》,2016年第2期。

④ 这一概念起初是被费孝通先生用于定义“中华民族”的基本特征的,此处则指的是大一统思想与实践具有丰富性、多元性。参见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⑤ 有学者指出,社会科学的认识方法存在解读与解释两个传统,前者主要是训诂意义上的,而后者则注重寻求因果关联。参见赵鼎新:《解释传统还是解读传统?——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出路何在》,赵鼎新:《国家、战争与历史发展:前现代中西模式的比较》,第211-216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被‘哲学史’描述,实在很成问题。”^①尤其是对于大一统这类直接关涉到政权合法性与治理有效性的重要概念,离开了对其生动政治实践的考察,离开了对其“变中求统”表现形态的把握,由“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②所开启的“大一统”言说,便将只能沦为一种无视史实的精英想象。尤其是当这种思维被运用于服务现实目标的致用尝试时,更会因其对历史想象和当代诉求的拙劣嫁接^③,而遭遇到质疑者郢书燕说之讥^④。相应的,那些据此宣称大一统对走向现代的中国具有“长治久安之理”^⑤意义的说法,必将被归为建构“虚假的统一性”的“超级文本”^⑥。但试图重新连接历史与现实的中国人而言,由于受影响于上述的“正典解读”式的思维误区,而对于连带着取消大一统的历史实在性与重要性,却又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事实上,大一统的文本意涵与其实践历程间不尽吻合这一事实,并不见得要被解释为传统/现代中国的制度与治理实践本质上无异于西方的明证,^⑦而完全可以得到更积极的解读,一种既避免将特定传统思想资源“刻意窄化和盲目自大”^⑧,又使思想史研究能够回应非西方道路探索需求的积极解读。在此,一切问题便都回到了在思想史考察中认识大一统的起点上。正是在这个起点上,我们需要突破“思想家的思想史”“正典解读”这类画地为牢的定式束缚,在更广阔的问题视野中重新勾画大一统思想与实践相呼应、历史与现实相交织的立体形象,从而把大一统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解放出来,在变动的时空中找到其历史、现实和未来存续的合理性依据。为此,我们不妨以思考如下几个大一统研究中具有理论张力的问题入手,尝试在新的语境与逻辑中重建对大一统的思想史研究。

二、大一统是“永恒智慧”还是特定语境中“问题逻辑”的产物

众所周知,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文本主义(Textualism)”“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解读路径之争中,后者取得了“主流学界内的显学”^⑨的地位。但在中国学界讨论思想史中的本土概念时,究竟是从诠释“正典”(the canonical)入手,来归纳出由连贯的文本所织就的“永恒智慧”(perennial questions)线索;还是从语境分析(read in context)入手,来分析孕育大一统思想连续性的社会历史条件,仍然是一个争议性问题。究其原因,则不外乎因为中国学术史与西方观念史研究中存在的惯性交集,也就是前者源远流长的“是古非今”传统和“春秋笔法”,与后者“回归古典”、反思现代性的主张以及强调“隐秘写作”(covert writing)方法间产生的共鸣。当然,在解读传统中国的思想文本时,这种方法并非全无意义的。毕竟,在“政治隐语”中传达“经世”情怀确实构成了许多中国士人的思想表述方式,但这与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所主张的哲人是为了使其惊人思想只限于在同行间传播的理由却是存在着差异的。而且,在不同时代中是否使用隐语,以及隐秘写作的程度,其实更多地取决于政治上的必要性。因此,今人在解析所谓“文

①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第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八)·春秋公羊传注疏》,第9~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 这一点在以新儒家为代表的学者进行思想史阐释的过程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如有学者就大力倡导“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参见秋风:《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文化纵横》,2013年第6期。

④⑦ 葛兆光:《对“天下”的想象——一个乌托邦想象背后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第29期。

⑤ 康有为:《复湖南赵省长恒惕论联省自治电》,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十一),第20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⑥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导论,第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⑧ 葛兆光:《对中国文化的最大曲解,是刻意窄化和盲目自大》,《文化纵横》,2019年第8期。

⑨ 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第30页,三联书店,2003年版。

本阴谋”时,不必也不能让自己陷入过分揣测作者原意的“过度诠释陷阱”中。因为,在此视阈中,通过当代人对古典文本的拼接和连缀,往往呈现出一种固化的、一以贯之的大一统观念。用常见的表述方式,就是笼统地强调大一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的固有遗产”,是“思想先行继而转化为政治实践”^①的古老成果,构成了“各族人民的普遍共识”,是一种“坚不可摧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心理定式”^②,从而也能够直接作用于论证当代中国的“道统合法性”和统一的“有效性与必然性”。^③

归根到底,“政治思想就是研究通常所使用的相对稳定的概念。”^④从寻求研究对象的稳定性角度看,这种解读方式有其合理性,但问题在于,由此建构出的高度理想化的“大一统想象”,往往并不能有效应对时兴的“复线历史”观^⑤与“区域化”现象史研究^⑥的挑战,在治学方面也更容易遭受“以名实不相副之解释,致读者起幻弊”^⑦的诟病。同时,强调大一统作为一种既成的政治遗产,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对大一统理想与现实间张力的考察,因而也限制了今人从大一统的“生长”历程中总结出更多的规律性内容。此外,放在传统政治思想遭遇近代西方理论冲击的视角下,所谓“永恒智慧”的提法也是十分可疑的,并不能解释大一统本身所经历的近代化转变。换言之,大一统的确没有被走向现代的中国所放弃,但却并非基于文化保守主义的理由,而恰在于重新发现和重建大一统的过程,实质上是对传统进行现代化改造的过程。因此,如果大一统被理解成一种“永恒智慧”,改造就是不必要且不可能的,今人的工作,也将仅限于为“正典”添加“庞大的注释”。可如此一来,思想史中的历史性就被完全破坏了。正如施特劳斯主义在西方的盛行割裂了价值观的历史性,从而在现实中助长了一种僵化而又野心勃勃的意识形态自负一样,^⑧简单地遵循“自古以来”逻辑对大一统所做的诠释,对于发展中走向世界的中国而言同样是十分有害的。

有鉴于此,在“把所有文本视为对问题的答案”^⑨的前提下诠释大一统思想,似乎就成为了一种更合理的选项。无论从考察大一统思想嬗变与时代议题嬗变呼应关系的角度,还是更具体地去分析关于大一统的当代论争,我们都会发现,大一统思想的持久生命力更多来自于其生长过程中的变化调适,而不取决于它是某些先贤对“永恒问题”的沉思后果,更不意味着它内涵着某些超越时空限制的“真理”。相应的,对大一统“自古以来”传承现象的解释,也应该回到现实政治与思想书写不分家的传统中去。从本质上说,中国思想史包括“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的历史”^⑩,而“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又往往是特定时代经济基础、政治形势、社会格局的产物。思想史是否有必要被写成“包罗万象的思想史”^⑪是另一个问题,但寻求“哲学思想、逻辑思

① 卜宪群:《谈我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思想与国家治理》,《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2期。

②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编:《当代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研究》,第九集,第10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③ 当然,从本质上说,这种中国语境中的“永恒智慧”认识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具有一定合理性的政治话语,而与西方学术语境中近似玄学的“永恒智慧”的含义是有所不同的。

④ 李宏图:《语境·概念·修辞——昆廷·斯金纳与思想史研究》,《世界历史》,2005年第4期。

⑤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导论,第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⑥ 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由“新清史学派”所带来“内亚视角”(the perspective of Inner Asia)的冲击。

⑦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15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⑧ 比如,美国新旧保守主义的争锋某种意义上正是处于政治思想哲学化、抽象化和非历史化的延长线上。参见艾伦·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克莱·G·瑞恩:《道德自负的美国:民主的危机与霸权的图谋》,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⑨ 拉亚·普劳考斯耐克:《历史地研究政治理论:昆廷·斯金纳访谈》,《政治思想史》,2014年第1期。

⑩⑪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第10页,第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想、社会思想”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①的结合却必然是有意义的。因为只有不断变化的时代问题与语境中理解大一统,才更符合历史原貌。并且,考虑到当代中国学人全然不必去肩负所谓“全力对抗那种堕落的自由主义”^②的原教旨主义“道德使命”,也并未面对“低估独立国家的持久生命力”^③的现实困境,我们还可以尝试去主动打通观念史与实践史之前的壁垒,系统地去为大一统思想所对应的制度实践进行一个历时性梳理,真正发现在变动中呈现规律性的政治史,从而使语境分析不仅服务于更好地解读文本^④,更能反过来为人们全面地理解形成语境的社会历史条件做好铺垫。

三、智识语境与政治语境如何影响对大一统的认知与评价

任何时代的政治思想都要受到相应的智识语境(Intellectual context)与政治语境(political context)的影响,大一统思想自然也不例外。但无论在中国传统学术还是西方传统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智识语境都相对更受重视,而政治语境则往往被作为应当刻意保持距离的禁域。客观地看,这一现象固然与某一段时期内学术与政治间“过度联姻”所留下的集体记忆有关。但是,如果把“去政治化”推向极端,却也可能在无意间剥离了政治思想史固有的“政治属性”,隐去了时人理解研究对象时不可或缺的政治背景,从而也将大大限制语境的完整呈现。事实上,“没有人会在一个政治真空中来撰写政治理论。”^⑤而仅从智识语境出发的语境主义研究,也无法真正承担起重塑大一统认知的使命。换言之,在语境中认识大一统,其实是回避不了以下几个语境自身的张力问题的:

第一,在孤立的智识语境中形成的认知往往孕育着偏见。正如有学者认识到的,“以思想的逻辑消解了学术的历史”^⑥的倾向仍存在于“以西释中”风尚尚未退潮的中国学界。在这一背景中,一方面,套用特定的外来理论来阐释大一统思想的产生、流变与影响,并据此做出西方中心主义预设下的价值评判,必然是一种常态。这些特定的外来理论可能是诸如“东方社会停滞论”“东方专制主义论”“想象的共同体”理论等,也可能是现代化中的“冲击-回应”理论,以及“韧性的威权主义论”。有学者认为,这种西方语境下的“中国学”为本质上的“外国学”,并指出,“对于海外中国学研究,我们始终要有清醒的认识,首先要明确它本质上还是‘外国学’,然后要有比较明确的立场与它进行批评的对话,而不是简单地跟风。”^⑦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许多中国学人而言,经由对所谓大一统与专制共生关系的解读还是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一度弥散于中国知识界的“启蒙情结”,也易于导致高估智识语境的独立性和自足性,从而使相关思想研究成为“生产思想赝品”^⑧的温床。这两种现象在我们重新认识大一统思想时都是应当尽力避免的。

第二,智识语境本身也受到政治语境的影响。这种现象突出反映于当下某些“以学术的发现颠覆思想的逻辑”的倾向中。就研究大一统思想而言,它具体表现为把发现有别于对大一统字面理解的“新材料”作为颠覆整体“大一统观念”的有力证据,而其中最突出的个案无疑当属

①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序,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② 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第33页。

③ 拉亚·普劳考斯耐克:《历史地研究政治理论:昆廷·斯金纳访谈》,《政治思想史》,2014年第1期。

④ 张晒:《从文本中心主义到历史语境主义:语境、概念与修辞》,《理论月刊》,2013年第5期。

⑤ 玛丽娅·伯克:《新史学:自由与对话》,第2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⑥ 杨国荣:《学术与思想之辩》,《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2期。

⑦ 葛兆光:《海外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文汇报》,2008年10月5日。

⑧ 邓正来编:《中国学术规范讨论文选》,第61~67页,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新清史学派”及其国内追随者们对于“汉化”主题的曲解与消解。^①事实上,作为与对“大一统”的理解有着密切关联的概念,在很长一个时段内,尤其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地位的新中国学界,“汉化”概念的使用,从来都不意味着一个所谓“汉族民族主义者”预设的历史诠释前提,而仅是用一个约定俗成的历史描述惯用语而已。换言之,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汉文明随着时代变迁而演化,一方面是内部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与那些汉化民族的接触扩充了汉文明的内涵。”^②在原始的中国智识语境中,由于“汉化”的实际内涵远比其字面含义来得丰富得多,而且这一点几乎已经成为整个中国学界的基本共识。因此,所谓“汉化”与民族特性的二元对立原本就不是一个真问题。然而,在西方学术仍可以凭借其整体霸权地位将其“发现”的,甚至是刻意炮制出来的伪问题输入并影响中国学界时,我们却完全可以看到一种政治语境对智识语境的主动塑造。不可否认,中国当下正处于一个智识语境的知识素材来源空前丰富的时代,但也正是在这个时代里,智识语境与其政治语境的背景将变得更加交缠。从表面上看,那种在统计学的意义,甚至仅仅是在新闻学意义上,把历史编织成“连续发生的事件的故事”^③的倾向是一个智识语境中范式偏差的问题;但究其实质,如果联系到对于政治语境的考察,谁又能说这不是历史诠释的“后革命化”“后体系化”“去中心化”的必然结果呢?就单纯的学术发展而言,正如有学者所担忧的,这种碎片化、枝节性的学术导向研究与“以西释中”的思想导向研究间看似时髦的组合于内于外都可能带来误导^④。而当我们把眼界进一步拓宽,去考察生成这种智识语境的政治条件时,则更没有理由无视后冷战时代中意识形态斗争对于西方主流/前沿学说的塑造。实际上,在所谓“反对极权主义”的前提下,批评民族国家、反对公共权力侵入私人领域,早就构成了西方主流学界的一种政治正确共识。这种共识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中国问题研究,并且更加强化了相当一部分人的“东方主义”立场。^⑤同时,此类现象也源于话语霸权的所有者认为,“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⑥话语霸权影响下“追踪-回应”的惯性引导着后发国家的学人只能去主动迎合这一语境的变动,反过来质疑基于本土智识传统生成的既有诠释的正当性与“科学性”;也引导着他们只能或是缩回到微观史研究的外壳中以索隐“真相”为业,或是在学术精神上沦为西方“中国学”亦步亦趋的注释者。总之,上述问题,绝不是一些试图澄清“学术与政治两分”的苍白辩词所能掩盖的^⑦。西方学界的中国问题研究其实从来也没有放弃过考察思想与政治有机关联的视角,这直接导致了无论是从何种角度来评判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大一统,都需要“适时”地对专制主义进行道德谴责,或是对整体主义结构下的当代中国表示忧虑。由此看来,智识语境从来都不是绝缘于政治语境的,而要真正

① 参见刘凤云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罗友枝:《清代宫廷社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② 刘凤云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第75页。

③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220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④ 《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编辑部编:《殊方未远:古代中国的民族、疆域与认同》,第1~12页,中华书局,2016年版。

⑤ 当然,这一判断不应被用为一种“立场决定论”的逻辑前提。事实上,例如同样是关注区域史的学者,拉铁摩尔和后来的“新清史学派”无论在学术、思想还是政治立场上都是存在巨大差异的。但这种情况终究只限于个别西方学者自觉确立起了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内省意识,而且从来没有在根本上影响到海外中国学的主流。

⑥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序论,第1页,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

⑦ 在接受《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的采访时,欧立德曾声称:“美国并没有像二战之前的日本那样,对亚洲大陆有过什么企图。现在,特朗普当选了总统,就更不会有这样的企图了,他甚至提出要放弃美国在亚洲的一切根据地……不少人批评新清史,说这是美国政府分裂中国的阴谋。他们对美国国情还不够了解,我相信其实也不是不了解,我不能说他们是故意曲解,但他们确实应该知道,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欧立德:《欧立德谈新清史及其争议》,《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6年11月26日。但站在中国立场上看,无论是谈历史还是看现实,上述辩白显然都是站不住脚的。

在中西方的学术话语权之争中赢得主动,我们便没有理由放弃从分析政治语境的角度,特别是在本土政治演变逻辑中来客观解构智识语境建构的奥秘。

第三,政治思想史的发展历程本身也是政治语境变迁的一部分。对于力图突破“文本主义”研究桎梏的中国学者而言,确立这一意识尤其重要。我们应当注意到,思想文本的撰写本身也构成了一种能动的政治行为,^①同时,政治撰述行为本身也要受到时代语境的限制。运用这一思维来分析大一统思想,我们就可能从分析具备可行性的政治话语(political languages)入手,发现大一统思想文本作者采用特定话语和表述方式的动因;也更容易理解主张和力图实现大一统的政治实践家为何选择、如何改造特定的思想文本来为己所用^②;还能更深入地认识在现代化过程中大一统从遭遇激烈批判到获得重新肯定的理由。例如,看到了大一统与近代中国国家建构任务间的关联,我们就可以理解康有为为何要援引《春秋》之义来陈述反对联省自治的主张;也更容易解释严复为何在反思传统大一统观念的同时,要把“近世均富言治”追比附会到“井田经国之规”的古意上,作为其重建“长治久安”之策的基础。^③总而言之,在变化的过程中理解研究对象之为“恒常之物”的规律,我们就会发现,不仅是时代议题的嬗变影响到了大一统思想,而且对大一统理解与阐释的变化,也反过来影响到现实政治,从而形成一条思想与现实间双向互动的历史线索。因此,要真正理解大一统思想与实践表现形式的历史多样性,就不可能回避政治语境变迁的影响,而这种打破“学术与政治”间藩篱的思维,也将有助于提供更充分的理论依据,来回应一些挑战“大一统”合法性的质疑。

正如有学者所言:“历史纪念活动总是会围绕着纪念者在当下历史处境中的问题和关切来展开。”^④理性的研究者从不讳言观念史之于实践史的关联,但也不会教条地认定,前者只是在被动地为后者做出事后的意识形态论证。当然,大一统思想研究本身,也是这条规律的实证体现,它既是特定语境中的产物,也在能动地建构着相应的智识与政治语境。因此,对于希望反思和超越西方既有的“语境主义”研究范式的中国学人而言,在语境与议题的互动过程^⑤中来研讨大一统思想,无疑是颇有意义的。

四、在大一统研究中如何规避两类“东方主义想象”

毋庸置疑,即便是最偏执的保守主义者,也不会公然声称某种传统是全不体现价值或规律普遍性的独特之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对于大一统的研究中不存在更强调其特殊性或是普遍性的差异与争鸣,更不意味着两种倾向对于诠释和评价大一统的影响相差无几。如果从总体倾向上看,一段时期以来,无论是站在传统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立场上,还是基于对这一立场的反动,国内外学界都往往更为关注传统政治元素中那些体现“中国特色”的成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于这些“特殊经验”的理解已经足够充分。事实上,对于特殊性的过分强调,

① 依照斯金纳的看法,“政治文本作者‘以言行事’的政治意图”是不可忽略的,其目的“无非是在通过写作取得同个人有关的政治支持。”孔新峰:《“语境”中的“语境主义”:昆廷·斯金纳政治思想史研究发微》,《政治思想史》,2010年第1期。

② 这一方面的典型案例就是官方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夷夏观的历史书写与诠释。

③ 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附〈天演论〉)》,第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④ 章永乐:《康有为的“中土比较”与戊戌的世界图景》,《东方学刊》,2018年第2期(冬季号)。

⑤ 有学者将其概括为“语境-议程-方法”的研究逻辑。杨光斌:《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第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反倒容易招致对于大一统的简单化认知与粗暴评判。如果只是从特殊性的维度来认识大一统,我们就很可能在比附思维和功利导向的双重影响下,“陷入以史证论的怪圈”^①,牵强地去为中国历史或现实中的成功锁定大一统的“文化基因”;当然,也可能意味着从相反的预设意识形态立场出发,将大一统思想视为前现代“封闭社会”的产物,批评其只能催生“功利而短视”的政策^②;固化人们对于大一统和“东方专制主义”间难分彼此的刻板印象^③。但这两类结论无助于使大一统融入现代中国政治结构中。因此,我们便有理由去同时警惕两种强调特殊性的“东方主义想象”:第一种是广为人知的,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Edward W. Said)所指的“东方主义想象”,它倾向于把传统中国化约为一个整体性的象征符号,在不同程度上等同于异端、落后和反现代性,并由此戏剧性地夸大统一性的程度及其“危险后果”。比如在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那里,他在有保留地肯定“由上到下浑然一体,能够让每一个人不停息地工作”所造成的中国的“非凡试验”的同时,也在老调重弹地批评着“中国多疑的民族主义和报复西方的愿望”,并轻率地认为:“中国在消除过去的痕迹的同时,要求成为第三世界的首都。那时它将再一次成为世界的‘中央帝国’。”^④一般而言,对于这种倾向,东方学者相对容易有所警惕和反思。但是,第二种来自于东方内部的“东方主义想象”的危害则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因为它表面上是沿着“去污名化”的路径去论证东方事物的合理性。这种沿着对东方历史的“寻根”式的想象,把中国从世界中剥离出来,又遵循着同样的逻辑,为中国当下的成功片面地解释为独特“历史基因”的必然结果。但从本质上说,这种言说与前一种东方主义想象并无二致,它们都没有跳出勾勒符号化历史记忆的窠臼,而只是在营造着一个乌托邦式的精神超市,不无投机地迎合着某些人群对于历史的不恰当功能性需求。同时,它还是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同一性趋势的评判相矛盾的。马克思建构起了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世界历史同一性趋势间的必然关联,也强调了这一过程之于传统社会的革命性特征。除非我们想在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理论逻辑上重建对于社会主义中国道路正当性的解释,否则,建立于革命基础上,而且作为此前世界历史趋势的延续与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大一统,又怎么能被解释为只是中国历史特殊基因的产物呢?

由此看来,既然强调特性的路径弊大于利,那么我们是否可能在重视共性的解释中发现大一统的当代价值呢?答案是肯定的,但同时又不是无条件的。因为,把大一统这一中国本土传统放到世界历史的视野中加以认识,并赋予其某种程度上的普遍性价值,需要我们全面而理性地把握所谓“普遍规律”的内涵,这意味着应该把大一统视为对共同体建构及其合法性论证问题的回应。站在历史的高度,“大一统”的基本逻辑旨归正是在于追求“真正的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大一统思想所回应的就不限于“建构中国”的诉求,而同样可能是“型塑欧洲”的渴望^⑤——只不过主观意愿与客观条件的耦合度差异,使两者的大一统实践遭遇了不同命运。站在今人的立场上,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大一统视为人类的政治生活突破地域性限制的必然要求。突破地域

① 王彦辉、薛洪波:《古史体系的建构与重塑——古史分期与社会形态理论研究》,第84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② 周庆智:《试析先秦“大一统”民族观》,《云南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③ 参见《秦晖对话刘仲敬:如何摆脱大共同体至上的路径依赖?》,2015年8月5日, http://culture.ifeng.com/a/20150805/44353906_0.shtml, 2019年8月1日。

④ 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第21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⑤ 刘小枫编:《西方古代的天下观》,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刘小枫:《亚历山大与西方古代世界的“大一统”》,《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李增洪:《中西古代“大一统”理念之比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等。

性的限制不仅是近代化过程中的趋势^①,同样也代表着人类政治生活演变史中的一种共性规律。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去进一步探究,这种趋势是如何体现于前现代的东西方社会,并最终在缘起于西欧的民族国家模式中找到了恰当归宿。在此基础上,我们甚至还可以把大一统视为既有西方治理模式之外的可行选项。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曾说过:“当然存在很多非西方的传统,但是它们并不必然构成对西方价值观的自发的代替性选择,相反仅仅提供了一些不同的生活观念的选择。”^②但相对而言,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看法或许更符合事实,即“西方经验或许只是幸运的尝试,一种失常的发展,一个死胡同,或者仅是许多可能的路径中的一种。”^③处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下,一切非西方的思想往往都不会被视为“活跃的理论中心”^④,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视野中,非西方国家都需要完成“转型正义”,以达到对西方政治话语的普遍接受与无差别实现^⑤。在这种总体氛围中,即便是中国本土学人,对于大一统世界性意义的评估可能都是不充分的,这就使得我们更有必要去突破前述思维定式,在一个新的理论预设下开展对于大一统历史可行性的再检验,以及对于大一统当代价值的新发现^⑥,并通过发现其中一些有趣的新问题,^⑦创造把治理共性规律从既有的单一西方模式载体中解放出来的契机。

显而易见,大一统既有传统性,又有现代性,既有本土性,又有世界性,因此,我们从“普遍规律”的角度来认识大一统还是要强调学术理性和政治理性,要把握好两对关系:一是稳定性和动态性的关系,即:认识到大一统的普遍性是从其与不断变动的时代问题间的互动中产生的^⑧,也是从其对自身思想-制度元素的不断变革中产生的^⑨,普遍规律的研究不能蜕化为一种对“永恒智慧”的当代阐释。二是“化中国为世界”愿景与现实可能的关系。作为对“普遍性”思维的一种平衡因素,我们不应忽视语境差异所施加的限定,不能让“学术民族主义”的冲动诱发思想领域的“过度诠释大跃进”,不能用功利性的注解来代替辩证的分析,更不能反向复制出一种“逆向东方主义”。唯其如此,才不致片面夸大或贬低大一统的“世界历史意义”,而是能够在对特殊经验与普遍规律的认识间建立起一种理性的平衡。

五、余论:以变释统,以统率变,在“变中求统”的语境与逻辑中思考大一统

政治思想的研究始于文本,却不必以文本研究为终点,这既是由政治思想之于哲学思想更形而下的属性所决定的,也是鉴于单纯从文本角度来理解传统思想,极可能产生两类殊途同归的弊端:一类是人为地建构出一种对历史的“连续性想象”,过于强调历史线索中体现同一性、稳定性和确定

① 对于资本突破地域性限制的趋势,马克思曾指出:“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2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 昆廷·斯金纳:《语境中的观念》,《哲学动态》,2017年第6期。

③ 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第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④ 李蕾:《对西方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16日。

⑤ 元光:《当代西方转型正义话语批判》,《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3期。

⑥ 事实上,已经有学者对“获得大一统主导地位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起码也是不大可能的。”这类基于近代欧洲均势政治的经验常识提出了质疑。许田波:《大一统对抗制衡》,《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1期。

⑦ 比如对于中西方“天下观/世界历史”的比较,刘小枫编:《西方古代的天下观》,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

⑧ 正如柯林武德所言:“政治学说史记载的并不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回答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问题,随着问题的变化,对问题的解答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第6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⑨ 正如布罗代尔所言:“一个文明可以欢迎或者排斥来自其他文明的成分一样,它也可以接纳或者拒绝它自己历史的残存物。这一选择过程并不缓慢,而几乎总是无意识地或部分地进行。但多亏这样,一个文明通过‘分割’出其固有过去的一部分,一点一点地改变着自己。”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第50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性的方面,而忽视或者低估历史流变的过程性及其影响。放在对大一统的认识上,就是把文本中存在逻辑连续性的表达误读为对既定史实的表述。就如把常引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解读为一种大一统意识的“发端”,而忽略了《小雅·北山》本身怨刺不平的原意。又如在判断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乃至其他国家关系时,仅关注“朝贡”大语境下的表述形式,而回避了在一定时段内诸如“自长城以南天子有之,长城以北单于有之”的现实状态。另一类则是过分拘泥于细碎史实,或是缺乏与新材料适配的新解释,或是将一些西方中国学的思维范式奉为圭臬,比如在套用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传统-现代/历史-价值/地方主义-世界主义”二元模式等理论的过程中,遗忘了从中国内部来看待历史的视角,导致一种“熟悉的历史陌生起来”的可疑研究进程。^①沿着上述两种路径来考察大一统的思想与实践史,所得出的都只能是简单化的认知与极化的评价,这等于是在正向或者反向地呼应着“传统中国的历史停滞不前”这一西方中心主义的预设,也等于是在变相宣称大一统已经真正成为一件历史旧物,不过是在等待一个相对合理的“最后审判”。^②显然,这并不符合我们在语境-思想-实践的有机关联、互动演化框架内重新认识大一统的基本原则。相应的,如果我们既不愿放弃“求实”层面的努力,又想保留宏大叙事在“求是”维度上的关怀,那么,重新思考变动历史中大一统“怎么样”“为什么”的内在同一性^③,适应在直面“变中之常”的研究过程中理解历史、总结规律的思维就显得更有意义。

在一个思想空前活跃、知识更新与传播空前便捷的时代里,在历史认知上达成共识的难度无疑大大增加了。如果说受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史观的影响,以往政治话语语境中大一统历史记忆与评价主要是基于“统一是主流/进步:分裂是支流/反动”的“史实/评价”简单对应逻辑所建构起来的;那么,随着近年来国内外学界的反思,在学术语境中对大一统历史实践的认识则变得更为复杂了。实际上,正如许多学者认识到的那样,就史实而言,“不能简单地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而以往人们常以‘统一时间长、分裂时间短’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实际上也是不准确的。”^④根据有学者的统计,中国历史上真正可以称之为大一统的时代在时长意义上或许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长^⑤,但这类新研究都并未指向对于大一统遗产的颠覆性认知。相反,只要明确了“统一或分裂时间的长短”并不“必然影响到‘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这一论断的正确性”^⑥,我们完全可以去具体分析统一实践的变动历史与大一统作为一种总体趋势的兼容性,进一步丰富我们对大一统的理解。换言之,在当代语境中展开的建构性导向的大一统研究,必然要求比以往更加关注大一统思想与实践的“生长”属性,要求给予大一统理想与现实间张力状态合理的解释,呼唤在本土逻辑中解读大一统的“变中求统”过程。大一统完成与维系过程的曲

① 但这种用法,其实也是多少有悖于一些秉持理性态度的西方汉学者的初衷的,因为他们原本想做的,不过是“发现的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能够激励中国读者用自身的内部观察视角来检视中国的过去与未来。”卜正民主编:《哈佛中国史》,第一卷,第17页,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

② 因为从政治话语变迁的角度看,往往只有当评价对象与现实的关联并不直接时,甚至对今人而言也不再那么重要时,对它的认知才会倾向于简单化、概念化,而对它的评价才容易出现两极分化。

③ 在多斯对年鉴学派的批评中,便指出过对这两者关系把握的失衡是后期年鉴学派的主要问题所在。弗良索瓦·多斯:《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第8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④ 邱久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一统”思想》,《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

⑤ 如有学者认为,封建时代的中国实际上有42%的时间是在非统一的局面中渡过的。计秋枫:《“大一统”的思想来源及其历史影响》,《光明日报》,2008年6月21日。而据另一些学者的看法,由于标准的差异,统一时间占比还要下降到42.9%。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第257页,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⑥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第257页。

折性与复杂性,并不影响大一统作为一个生长出来的历史过程的趋势性,“这便是多元统一历史实践和大一统思想学说相伴相生、不断发展和升华的史实。”^①无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角度考察,大一统思想的生长史都可以被视为一个调整和克服自身张力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大一统相对稳定的精神内核,并没有被理想完成形态与不完美的统一态势之间的形式张力、突破地理疆界局限与“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间的标准张力、“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的理念与强调夷夏之辨的文化张力、“以夏变夷”原始预期与多民族建构大一统的实践间的逻辑—实践张力等困境所消解,而是将化解这些张力的可能纳入到塑造出“一个移动的‘中国’”^②的动态过程中。在这种“变中求统”的视野内,我们所看到的就将不再是忽略那些“‘被压制的历史可能性’和未经尝试的历史路径”^③的大一统结论史,而是大一统思想与实践鲜活的生长史。据此,我们也就可以从逻辑和事实上直面和回答为什么中国的大一统逻辑在现实中压倒了反大一统的逻辑,并最终“长入”中国的政治传统中的问题;可以在较少受到“专制原罪”思维干扰的情况下,探讨大一统赋予传统中国治理绩效和治理制度化水平比较优势的问题;乃至可以解释近代化冲击来临时,被认为由大一统带来所谓“规模不经济(diseconomy of scale)”^④问题的中国,还可以经过“夫求强在合群”^⑤这一观念转变的中介,很快跨越因对大一统对应于国弱民愚的初级认识阶段,达成“统一则必治安而修明”^⑥的共识。

归而言之,实现大一统认知的思想转变,最关键的是承认大一统是回应变动中的时代问题的产物,是智识语境、政治语境共同塑造的产物,也是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独特性与作为世界范围尝试的普遍性具体统一的产物。历史中的大一统本身就是多元一体的,从大一统共识的多元一体,到大一统存在形态的多元一体,从大一统边界的多元一体到大一统文化的多元一体,莫不是属性的内在规定使然。可以说,没有“变”的过程,就没有“统”的稳固。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没有“统”的内核,就不会产生“变”的动力。历史中的生长塑造和成就了大一统,而这一生长过程时至今日仍未中断,仍可以在其固有的问题回应逻辑和“变中求统”的规律性中持续下去。认识到了这一点,一些诸如在传统与现代间被迫做出单项选择之类的问题就将迎刃而解,同时,困扰着对大一统理解的具体研究与定性评价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得到更合理的解释。^⑦更重要的是,从这种学理逻辑与当代致用逻辑关系的重构中,那些蕴含于大一统历史过程中的本土经验与规律还将逐渐浮现出来,使得思想史的研究真正成为时代背景中的有用之学。^⑧

作者:林毅,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市,100084)

(责任编辑:刘杰)

① 丁德科:《略论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思想》,《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②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第33页,中华书局,2011年版。

③ 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第8页。

④ 罗威廉:《哈佛中国史》,第六卷,第257页,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版。

⑤ 康有为:《康有为全集》(七),第20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⑥ 康有为:《康有为全集》(十一),第20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⑦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从时间的延续性而言,中国是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文明共同体’,一贯连续的,而且明确以中原为中心。二是‘从地域空间的角度而言,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多王朝、多个国家政权并存的空间复合体’。”所谓“汉化”或者“中国化”并不等于否认和消解中国历史的多民族和多样性色彩。许纪霖:《从边疆看中国:一种不可忽视的历史视野》,《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27日。

⑧ 有学者从文化、意识形态和对抗西方肢解中国企图的角度,高度评价了大一统作为稳定的传统政治遗产的价值。邱久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一统”思想》,《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4期。